

民初北京通俗讲演评析

万 妮 娜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民国初年, 通俗讲演在北京以固定讲演、庙会讲演、巡行和巡回讲演等方式展开, 充当了社会教育的开路先锋。政府期望通过通俗讲演达到启导国民、改良社会的目的。通俗讲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通达于民众的目的, 但是由于经验的缺乏, 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

[关键词] 社会教育; 通俗讲演; 北京; 民国初年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1) 02-0095-06

通俗讲演最初被称为宣讲, 1915 年后改称通俗讲演。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 教育部于 1912 年设立了社会教育司, 主管民众教育。至于教育方式, 教育部在给各省的通电中明确指出: “惟社会教育, 亦为今日急务。入手之方, 亦先注重宣讲。”^{[1](P987)} 这样, 宣讲也即通俗讲演, 成为民国初年社会教育的开路先锋。在教育部和京师学务局的推行下, 民国初年北京的通俗讲演事业^[2]一度办得有声有色。20 世纪 20 年代后, 公立通俗讲演大不如前, 终至销声匿迹。目前, 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3] 本文拟对民初北京通俗讲演的实施方式、职能、效果及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抛砖引玉。

一、社会教育的开路先锋

通俗讲演之所以兴起并成为社会教育的开路先锋, 是由其自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 宣讲作为古已有之的信息传播方式历代沿袭, 直至清代, 仍是政府教化百姓的重要手段。1906 年清学部颁布《奏定劝学所章程》, 要求各地实施宣讲。中华民国成立后, 在京师学务局通俗科科长祝椿年的主持下, 京师各学区设立宣讲所, 举办宣讲事业。

其次, 通俗讲演作为一种腾诸口耳的教育方式, 比其他社教方式显得收效更快。讲演是

“在同一时间和地方, 一个人对着许多听众, 用他自己所构成的资料, 有头有尾有条理, 从口里说出来, 使听众们都明白了解”。^{[4](P2)} 在讲演过程中, 讲演员的语言、声调、情态等可随机应变, 能使听众于顷刻之间对所讲内容形成印象。通俗讲演与书本学习相比, “容易而直捷”; 与实物展览相比, “正确而清切”; 与书刊阅读相比, 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这是通俗讲演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再次, 通俗讲演在形式上与说书类似, 便于民众接受。黄炎培在考察北京通俗教育后, 认为通俗讲演之所以在北方开展得较好, 原因在于“京师之民有惯习焉, 业务余暇必听讲书词小说, 久乃成癖, 或日用饮食之不可分离。今导以宣讲, 变其义, 仍其形, 民之听之, 若犹是书词小说也, 故势至顺而易效, 南方无是”。^{[1](P1019)} 这种看法符合北京当时的社会状况。尽管讲演员在讲演中为不失尊严力图区别于说书, 可是为吸引听众兴趣, 又不得不多讲故事, “使听众自觉与赴说书馆听书无异”而乐于前来。

最后, 通俗讲演施行简便,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无疑是最佳之选。京师学务局在给教育部的呈文中屡次提及受经费所限, 办理通俗教育不得不有所选择、逐步开展。根据《京师学务局筹办通俗教育预算表》可知, 学务局起初有一个

[收稿日期] 2010-10-13

[作者简介] 万 妮 娜 (1982 -), 女, 山东烟台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宏大的通俗教育计划，拟举办的项目有三十项之多。迫于经费，至1913年5月，学务局开办项目仅有宣讲所八处、阅报所六处、通俗图书馆（后改称为公众阅书处）三处、公众补习学校一处以及庙会宣讲两处，宣讲人员只有12人，巡行室讲员和巡回室讲员各6人。其中，除公众补习学校、阅报所和通俗图书馆外，其余全与讲演相关。即便阅书报处，也与讲演所合为一处。根据经费开支数目，固定宣讲所每处每月28元，四处房租51元，八处每月共需275元。巡行和巡回宣讲仅需支付讲员工资和车马费，需费更少。而公众补习学校一处，每月需84元。^[5]耗费少、施行便是通俗讲演在民初得到重视不可忽视的原因。

北京的通俗讲演始于城区，后扩至四郊，实施的方式有固定讲演、庙会讲演、巡行讲演、巡回讲演及少量临时讲演。城区以固定讲演的方式展开，表现形式是设立讲演所，在每天规定的时间内举行讲演。1912年，京师学务局首先在城区开办宣讲所八处，即京师第二至第九宣讲所。房屋部分系租来，部分就各学区劝学所办公处。1913年9月设立第一宣讲所，10月设立第十宣讲所。1915年10月，在第一公众阅书处的基础上，增设第十一宣讲所。1915年10月23日教育部颁发《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其中第五条规定：“凡通俗教育讲演机关应一律称为通俗教育讲演所并陈明公立或私立字样。”^[6]北京的宣讲所随之改称为“京师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各讲演所初由相应学区劝学员负责经理，1917年劝学所取消后，由金庚绪统一担任内外城各公立讲演所及巡行、巡回讲演经理员。每个讲演所有讲员两到三人。由于所租房屋出现所有权纠纷，第十讲演所于1916年3月停止讲演。次年4月，第十一讲演所改称第十讲演所。

1916年2月，教育部所属模范讲演所成立，地址在正阳门外虎坊桥东越中先贤祠。其讲员分为两组：一组在所内按日讲演，一组在所外巡回讲演，并于夜间加演幻灯及电影。1918年11月，第七讲演所由于位置与第九讲演所和模范讲演所相距不远，听讲人数减少而予以停办。北京的公立讲演所至此存十处。另外，外左三区于1916年8月成立地方公立第一通俗教育讲演所。

该所附设于外左三区地方公立第一半日学校内，所有经费由该地绅商捐助，讲员义务讲演，存续时间不详。

除固定讲演外，每逢庙会市集，学务局还举办庙会讲演。庙会讲演有固定地点，无固定讲演员。1912年9月，学务局在南药王庙举行第一次庙会讲演。1913年1月开办护国寺庙会讲演，4月开办隆福寺、土地庙、花市等庙会讲演，1914年5月开办白塔寺庙会讲演。由于各处庙会市集时间固定，学务局据此制定时间表开展讲演活动。庙会讲演起初委托相应学区的劝学员经理，后由金庚绪统一管理。除此之外，学务局还聘请专门的巡行、巡回讲演员外出讲演。巡行讲演没有固定地点，多为街头人众聚集之处；巡回讲演地点多为各讲演所，兼及庙会市集。巡行讲演首次举行于1913年3月。1917年8月，巡行讲演由于“名称既与现在事实不合”，改称为庙会讲演。^[7]

郊区在很长时间内仅西郊有私立四王府宣讲所一处。通俗教育研究会建议通俗讲演在郊区可先从巡行讲演入手。学务局认为“京师四郊地方辽阔，巡行讲演一时殊难普遍”，决定先在庙会市集举办以开风气。虑及交通不便，且各庙会时间接近甚或重叠，学务局选取“必须讲演之所及适宜讲演之期配定地点日期”，要求郊外各区劝学员筹备举办。1916年东南西北各郊区在庙会期间首次举办讲演，每处讲员三到九人不等，除阴雨天气外，每次听众在二千人左右。1917年郊外庙会期间，各郊区举行了临时讲演。为继续推广通俗教育，同年8月1日学务局在四郊添设了四处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除此之外，学务局还选择村庄进行临时讲演，并配合游艺以吸引听众。至1925年，北京的通俗讲演维持在二十处，包括城区讲演所九处、庙会讲演所六处、郊区讲演所四处及模范讲演所一处。

讲演员由学务局统一聘定，起初没有明确的资格限制。第一批讲演员均为通俗讲演研究会会员，年龄最小的21岁，最大的45岁，平均年龄31岁。其中部分讲员在清末已从事宣讲工作，如第九宣讲所讲员苏联奎曾在外城第一学区宣讲，刘敦本曾在青云阁宣讲。^[8]除通俗讲演研究所^[9]毕业生外，国民学校教员也是讲员的重要

来源。1915年10月教育部制定《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其中第九条规定，所长及讲演员须年在25岁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讲演传习所或通俗教育研究所毕业者；曾任讲演一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曾任小学校以上之教员或简易师范毕业者；教育会劝学所各职员；地方绅董夙有学望者。此条例规定了讲演员的资格。在随后的人事变动中，根据已有的材料可知，充实进讲员队伍

的有小学教员、高等院校毕业生（如日本明治大学、中央政法专门学校）、京兆通俗讲演传习所毕业生、乙种农业教员养习所毕业生，还有一例为中学图书室事务员。其中，小学教员占绝大多数，资格基本符合部定规则。表1为1915年前后北京通俗讲演员的来源情况，具体印证了前述的资格规定。

表1 1915年前后北京通俗讲演员来源表

展锦堂	通俗讲演研究所毕业	胡绪奎	通俗讲演研究所毕业
白喜麟	前北京商报编辑	杨海清	八旗师范学校毕业
关承琳	公立第二十七国民学校教员	刘广顺	通俗讲演研究所毕业
顾金锈	通俗讲演研究所毕业	金承新	公立第十六国民学校教员
黄玉麟	八旗高等学堂中学毕业	书 鉴	浙江高等学校毕业
孙文斌	公立第十六国民学校教员	丁伟东	公立第十六国民学校教员
郭保中	北京创办通俗讲演时，该员即在宴会楼宣讲	谢 源	公立第十六国民学校教员
多 福	公立第十六国民学校教员	谢启勋	公立第二十五国民学校教员
苏联魁	私立国民学校教员	王庚甲	通俗讲演研究所毕业
何容鋆	通俗讲演研究所毕业	韩 旭	通俗讲演研究所毕业
关启元	通俗讲演研究所毕业	顾显荣	通俗讲演研究所毕业
刘豫泰	不详	李荣昌	不详

资料来源：根据《视察京师通俗教育报告》（1915年10月）整理而成。巡行和巡回讲员由于缺乏资料没有统计在内。李桂林等编：《普通教育》第1022~1032页。

二、启导国民 改良社会

民国建立后，专制制度虽然废除，但民众素质普遍偏低，如何荡除民众落后的思想观念、输入新知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通俗讲演承担了这一职责。根据《通俗讲演规则》，通俗讲演的宗旨是启导国民、改良社会，即以通俗讲演为媒介，通过向民众灌输新知识、新道德，启导国民，进而改良社会。

1913年的《宣讲所规则》没有规定宣讲内容，仅发布宣讲书目以供参考。当时，宣讲尚缺乏明确的宗旨和统一标准。宣讲书目有：《欧美教育观》《儿童教育鉴》《儿童修身之感情》《鲁滨逊漂流记》《纳尔逊传》《克莱武传》《澳洲历险记》《万里寻亲记》《世界读本》《普通新智识读本》《普通理化问答》《富国学问答》

《农话》《普通农学浅说》《稿者传》《蚕桑浅说》《蚕桑简明图说》《冶工铁事》《致富锦囊》《普通商业问答》《蒙学卫生实在易》《黑奴吁天录》《启蒙画报》《家庭教育》《新社会》，还有教育部通告、内务部通告、京师学务局布告、各种教育杂志、违警律、地方自治章程、印花税章程和国会法浅释等。^[10]

由书目可知，讲演内容蕴含了现代国民所应具备的初步知识及道德修养，其中既有儿童教育、国民道德、世界知识、普通常识、生计卫生、家庭教育，也有政府公报和法令章程。

1914年6月，修订后的《宣讲所规则》规定，“宣讲资料务取纯正而切于实用，除由局随时发布外，凡政府公布之法律命令为一般人民必须知悉遵守者均应宣讲”。^[11]

1915年10月颁发的《通俗教育讲演规则》

对讲演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该规则将通俗讲演分为普通讲演和特别讲演，涉及到这两种讲演的规则如下：

第二条 通俗讲演分为普通特别二种，不得涉及通俗教育以外之事项。

第三条 普通讲演要项有：鼓励爱国，劝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

第四条 特别讲演要项有：关于临时事变者，如国内国际之天灾事变等；关于特别地点者，如工场、监狱、看守所、惠济所、感化院。^[12]

规则第三条将之前模糊概括的宣讲内容进行了清晰的提炼，并增加了“启发美感”和“注重体育”两项内容。讲演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前述书目，可依照标准进行拓展。

京师学务局随即制定《京师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单行规则》，要求讲演员遵照部定规则第三条切实讲演，并依照该规则所载各要项拟定题目，撰写讲稿，定期交由学务局审核编录。所出题目计有国民爱国当尽本分、道德是立国的根本、朋友相处的道理、戒私斗、戒依赖性、崇节俭、公共卫生和家庭清洁等。特别讲演由学务局临时通知。讲演材料除上述书籍外，还包括各省优秀讲稿、模范讲演所讲稿、通俗讲演录，通俗教育研究会选编的讲稿及历史、科学杂志等。通俗教育研究会不定期地审核通过新的讲演参考书籍。自此，北京的通俗讲演有了明确标准。

美国社会学者甘博在1918年9月至1919年12月对北京的通俗讲演进行了调查，将讲演内容分为九类：即，国际国内政治问题，教育问题，道德、友谊、权利之关系，科学，经济，体育健康和卫生，家庭教育、家庭，一般问题与历史问题，社会改良。^{[13](P490~493)}由此可知，讲演内容涵盖了国际政治、伦理道德、体育卫生各个方面，符合部定规则。

另外，根据教育部的指示，京师学务局也通过讲演对一些重要的社会内容进行宣传。此类题目计有权度法、戒吸鸦片、禁止儿童吸食纸烟、国旗、剪发、义务教育、印花税、公债、违警罚法、提倡实业等。

在主题纷杂的讲演中，道德是通俗讲演的侧

重点。民初教育部在给各省筹办社会教育的通电中，提出在宣讲过程中需“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且此后不断重申。1918年11月教育部给各省的咨文中称：“讲演一事于社会教育关系至巨，所以启迪国民者事理繁琐，而道德实为根本”，要求各讲演机关将“增进道德”列入通俗教育讲演规程。^[14]道德类讲题涉及到的内容有：公德、守法与道德的关系、真理、人格的诚实、真理与正义行为的关系、独立的精神、自力更生、为公的精神、谦恭与善良、爱国主义、个人品德、节省你的金钱、纳税之义务、良好声誉的价值、手足情义、自尊、勤奋、诚实、依靠自我、忍耐、合作、责任、勇气、孝心，友谊、如何获得内心的安宁、美德与贪欲、勿贪钱财、民众的责任、西方人有公德精神等。^{[4](P490~493)}可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政府的“道德”观已逐渐脱离旧式道德的范畴，公德、责任、守法、纳税、合作等现代国民道德成为言说的主流。

三、效果与问题

民国初年北京的通俗讲演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效果如何，需要实际资料予以说明。到目前为止，没有资料显示听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讲演内容，笔者试从听讲情况进行侧面分析。

各处听讲情况不一，有的讲演所情况较好，有的较差。根据1915年的视察，第二宣讲所成绩最好。“该所开办最早，所有听讲之人数，年来无甚间断，殊甚难得，故其程度较他处听讲人为优。讲员所采用之资料亦较他处稍深。京师宣讲所成绩之佳，当以该所为第一”。“该所听讲者，每日有一定人数，且皆能专心听讲，举动亦极守秩序，非讲演终了不肯即出，且多有作笔记者，其程度较他处听讲人为优”。第九宣讲所“听讲人数甚多，似每日必来听讲，且极守秩序，非讲毕无甚退出者，颇为难得。该所成绩较第二宣讲所略逊，应列为第二”。^{[11](P1024~1025)}由于讲演所多处繁华地段，在实际中更多的情况是听众随到随散，处于流动性中，听讲人数不能固定，有时听讲者仅在十人左右。有的宣讲所为应付视察，多以小学生前来凑集人数。甚至有的宣讲所旷废职务，经常停讲。庙会讲演在正常气候

条件下，听众少则数百，多则上千；举行幻灯讲演时，则听者众多，秩序井然。但是，这种讲演往往环境嘈杂，即便不排除优秀讲演的吸引力，部分听众也恐不能静心听讲。在四郊村庄的讲演常配合游艺，开通风气的同时，成为村民枯燥生活的调剂品。对于听讲情况虽不可做乐观估计，但讲演报告中频频使用的“领首”、“鼓掌”等词，或可理解为讲演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村民的共鸣。

毋庸讳言，受多种因素制约，通俗讲演在民初实行过程中有些步履蹒跚。其中，讲演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他们是通俗讲演的主角，也可以说是民众的导师，他们的学识、能力、技术、德性、言行以及服务精神，直接影响通俗演讲事业的成败。北京不缺乏优秀讲员，如巡回讲员傅锐，学术、口才俱佳，即便枯燥的题目，经其阐释，也变得娓娓动听，被誉为“讲员中不可多得之才”。该讲员极受欢迎，所到之处听众非常踊跃，有时甚至较平常多一倍。讲员王翰宗学养丰厚，讲演过程征引繁富，语言清晰，态度自然和蔼。但是，多数讲员在讲演中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如王庚甲口才不错，很受欢迎，但学识稍差，态度欠庄。还有一些讲员的讲演由于准备不足、照搬原文、缺乏论断而显得非常沉闷。教育部在1915年的视察中涉及23名讲员，得到好评的仅6人；^{[1](P1022~1032)}1916年的视察涉及21名讲员，基本合格的有11人。^{[1](P1033~1045)}

讲演员总体素质偏低衍生出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讲演内容陈陈相因，不能及时更新。通俗教育研究会曾邀请专门人员，以星期讲演的方式为讲演员补充常识，提高工作能力，但成效并不明显。笔者认为在资料中频繁出现的人员对调的指令，或可理解为学务局无奈中的变通之举。1925年，学务局还试图对此问题进行改革，取消以前各所派定讲员的方式，重新聘定讲员，制定讲演分配表，要求各讲员按照表格轮流赴各讲演所讲演，可惜此时的通俗讲演已呈有气无力之状，改革缺乏充分实施的条件。

此外，通俗讲演还存在技术的失误和硬件的

不足等问题。首先，由于缺乏经验，通俗讲演的运行处于摸索状态，讲演时间长期处于调整之中。起初，固定讲演除天气恶劣外，每日下午均需举行，且需讲满三小时。之后渐有年假和寒假，1921年后始规定每周可休息一日，讲演时间改在晚上，每天两小时。时间安排不当，一方面与民众工作时间发生冲突，民众无暇前来；另一方面使得讲员工作时间过长，易生懈怠，且缺乏自我充实的时间。其次，有的讲演所环境不适、卫生不佳导致听讲人数不多。如第六宣讲所起初设在打磨厂铁柱宫的门道内，空间狭窄，冬天十分寒冷，移至室内后，听讲人数才逐渐增多。另外，学务局经常下令敦促讲演所注意卫生：“座位墙壁均须拂拭净洁，屋顶墙角地面均不得有浮积尘土，时常开窗通风，门外多泼净水以靖浮尘。避瘟药水亦须常备，听众有痰唾不就痰盂或面污衣污者时常以婉言劝之。”^[15]这反映了讲演所的卫生状况不佳，也体现了学务局力图为民众营造一个舒适卫生的听讲环境。

四、结语

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是精英教育，普通民众多被排斥在教育体制之外。鸦片战争后，随着外患日迫，社会精英和清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国落后和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民众素质低下，开始重视“开民智”、“新民德”。民国建立后，“国民程度”成为国家建设的严重障碍。社会教育司的设立，意味着面向普通民众的社会教育被纳入教育体制，并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京师学务局希望借助通俗讲演，寓教育于休闲，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民众素质的提升。其采取多种方式推广通俗讲演，并常配以幻灯片和游艺活动，目的在于吸引更多听众。讲演内容渗透着现代性，体现了政府对于培养现代国民的美好愿望。民国初年的通俗讲演是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将新知识、新道德的甘霖播洒于民众的心田，以期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实，新式国民的养成是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民初北京通俗讲演或可理解为这一过程中的一环。

注释：

- [1] 李桂林等.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 [Z].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2] 除政府推行的通俗讲演外，还有一些社会教育组织和私立讲演社团从事讲演活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政府推行下的通俗讲演事业。在时间上，本文以民国初年为限，根据通俗讲演的发展情况集中在1920年之前，不超出北京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成立后仅设立一处公立讲演所，且不久便因有名无实而被改为阅书报处。
- [3] 目前，仅有袁熹. 清末民初北京的讲演所 [J]. 北京档案史料, 2001 (3); 杨红军. 清末民初北京的阅报讲演活动 [J]. 北京档案史料, 2004 (3) 两篇文章涉及到通俗讲演。袁文对清末民初讲演所的沿革、组织结构、讲演内容等给予简要概述；杨文对当时的阅报和讲演活动进行探讨，重点在私立的讲演阅报社团。
- [4] 俞雍衡. 通俗讲演 [M]. 浙江：浙江省立图书馆，1931.
- [5] 北京档案馆. 京师各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关于经费问题的呈及京师学务局的复函（附：通俗教育经费分配表、预算表） [Z]. 档号：J4-1-82, 1913~1915.
- [6] 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 [J]. 京师教育报, 1915 (22).
- [7] 京师教育报 [J]. 1917 (46).
- [8] 北京档案馆. 京师第九学区宣讲所职员履历册 [Z]. 档号：J4-1-131, 1916.
- [9] 笔者以为，此处通俗讲演研究所应与前处通俗讲演研究会为同一机构。此处使用通俗讲演研究所是基于下处表格原文。该表格是根据教育部的视察报告整理而来，讲员名单中有十人同第一批讲员。一字之差，应为误称。
- [10] 北京档案馆. 京师学务局所办通俗教育各项章程表册、宣讲书、通俗教育调查会章程、公立图书馆管理规则、图书目录及公众补习学校简章等 [Z]. 档号：J4-1-76, 1913.
- [11] 北京档案馆. 宣讲所规则 (1914年6月改订) [Z]. 档号：J4-1-122, 1915.
- [12] 京师教育报 [J]. 1915 (22).
- [13] [美] 西德尼. D. 甘博著，陈渝秉等译. 北京的社会调查（下）[M]. 北京：中国书店，2010.
- [14] 北京档案馆. 教育部和京师学务局关于遵照大总统明令注重“道德教育”的训令 [Z]. 档号：J4-1-184, 1918.
- [15] 京师教育报 [N]. 1917 (42).

Review on Popular Lectures in Beijing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WAN Ni-na

(History Depart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popular lectures played a role of trailbreaker in social education. In Beijing there were various forms of popular lectures such as routine lectures, lectures in temple fair and itinerant lectures. These lecture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through these lectures the government expected to enlighten the people and reform the society. Popular lectures, in some degree, were accepted and understood by the common people. However, due to the shortage of experiences, there appeared a variety of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al process.

Keywords: social education, popular lectures; Beijing;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